



新词语 大词典

(1978-2002)

XINCIYUDACID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
开发与应用”（01CYY002）最新成果之一

主编 亢世勇 刘海润

审订 张志毅 张绍麒

新词语

大词典

(1978-2002)

XINCIYUDACID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
开发与应用”（01CYY002）最新成果之一

主编 亢世勇 刘海润

审订 张志毅 张绍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词语大词典/亢世勇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10

ISBN 7 - 5326 - 1311 - 9

I . 新... II . 亢... III . 汉语—新词语—词典
IV . H136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307 号

新词语大词典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5.75 插页 5 字数 2 055 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 - 5326 - 1311 - 9/H·179

定价: 86.00 元

序一

新词语是社会发展和演变的符号，尤其在社会巨变时反映最为明显。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会有反映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的词语。远的不说，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情况，即可充分说明。

建国初期，万象更新，反映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如“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等。社会的大变革，带来社会风气的大变化。即使日常生活用语，也有相应反映。人们见面，一般不再称“先生”、“小姐”，而改称“同志”；如果提及对方的丈夫或妻子，一般不再称“先生”或“夫人”，而改称为“爱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是一番景象。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造反派”、“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棚”、“喷气式”、“夺权”、“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等等新词语，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红色”恐怖跃然于言谈之中，媒体之上。

改革开放后，旧貌换新颜。新词语随着社会的变化应运而生，如“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经济特区”、“三个代表”等等。这些词语如

同一阵春风，不仅扫除了“文革”语言中的极左流毒，而且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气象。

新词语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对记载历史、研究历史、保存文化、发展文化都有重大意义。无论前者后者，都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用辞典形式对它进行疏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就是整理文化遗产，以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

即使在一定时期出现的昙花一现的新词语，也是某种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仍有重要作用。譬如现在的青年人，对于前面说过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喷气式”、“牛棚”等“文革”语言，已经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而在这一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奇特历史中形成的语言，无论如何荒谬，仍不失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面镜子，因而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对它进行整理，让后代人永远记取历史教训，是学术界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至于改革开放后的新词语，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创建国后的历史纪录。这些新词语既是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的心声，又是新时期科学文化、风土人情和人际关系不断演进的写照，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其重要意义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虽然风云万变，新词语层出不穷，但在1987年之前，却无一本像样的新词语辞典问世。可以说，辞书领域还有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87年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闵家骥等编著的《汉语新词词典》之后，新词语词典争奇斗艳，一发而不可收拾（参见本书“附录二”）。

许多新词语辞书问世，虽然多有重复，质量参差不齐，但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逐步改进，逐步提高，

却是基本趋势。从而,不仅填补了汉语辞书的空白,而且大大改变了汉语研究和汉语辞书远远落后于语言变化的实际状况,并使祖国的文化宝库中增添了新的硕果。

在众多新词语辞书中,亢世勇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堪称集大成者。

《新词语大词典》收词2万条,远远超过所有同类书。一般同类书收词,多则1万,少则千余。收词太少,不仅不足以反映新词语现状,而且,读者查十缺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辞书解惑释疑的作用。《新词语大词典》收词,涉及新造词语、旧词新用、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外来词、缩略语、专业用语(进入普通话)、字母词、引申词、借代词、仿拟词等若干门类,还附有网络用语,称之为“大”词典,名副其实。

《新词语大词典》,不仅词头用汉语拼音注音,而且每个词语(短语除外)都标注了词性,既可以帮助说明词义,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语的用法。词类分为名词、时间词、方位词、处所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状态词、副词、代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等。对两万个条目,逐一甄别定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新词语大词典》在书证方面也很见功夫。它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报系的其他报纸及人民网的语料库为基础立目、释义和取证。一般一个词语都有两个书证。如[大本](名)“大学本科”的简称。与“大专”相对而言。◇调整充实了校级干部51人,使现有干部的学历全部达到大专以上,其中达到大本学历的占63%。(人民日报.1994.4.12)俗话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一下子就大本了……。(人民日报.2000.11.27)书证是定义的具体化。它再现这一新词语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惟有在有影响的媒体上取证,才能证明新词语释义具有普遍性

和权威性。这是编纂者自编书证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包括亢世勇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在内的新词语辞书，在编纂和出版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略谈几点，就教于语言学界、辞书学界的同仁。

首先，从已出新词语辞典看，收词随意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据徐祖友先生所述（见《辞书研究》1995年第1期《初创既成更待提高》），有一部新词语词典“飞”字头下收了“飞扬”、“飞红”、“飞报”、“飞步”、“飞奔”等词。据他考证：

[飞扬]“放纵”义已见于《庄子·天地》，“心神不定”义见于《后汉书·袁安传》，“昂扬，振奋”义见金·周昂《早起》诗。

[飞红]“（脸上）飞快地出现红晕”义见《金瓶梅》，“犹绯红”义见《红楼梦》。

[飞报]“迅速报告”义见宋·洪迈《容斋三笔》。

[飞步]“疾步如飞”义见南朝宋·鲍照《拟古》诗。

[飞奔]“疾跑”义见唐·韩愈文。

从中一眼就可看出，这些词由来已久，收入古汉语词典尚可，收入新词语词典，不伦不类，是一个明知故犯的错误。

有些词语，如“打”字头下的“打白条”、“打成一片”、“打棍子”、“打横炮”、“打屁股”、“打前站”、“打头阵”、“打退堂鼓”等；“大”字头下面的“大部头”、“大吃大喝”、“大道理”、“大锅饭”、“大红伞”等，虽不属古汉语词语，但早已使用，本义和喻义与现在没有原则区别。把它们收了进来，违背新词语词典的宗旨和体例，从而影响辞典的质量。众所周知，媒体上所用的词语，并不都是新词语。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等报刊用过这些词，有书证可据，于是它们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语词。同样，《现代汉语词典》未收的词语甚多，不能认为它未收的词语就是新词语。

2003年《青年一代》6月号文章《今日流行语》中,有“青蛙(俊男)与恐龙(丑女)”、“海龟(海外归来创业的留学生)”、“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分子)”、“北大荒(北京大龄还‘荒’着的女性)”等新词语。网上又有“菌男(俊男)”、“霉女(美女)”等新词语。这些词语如果不是低级下流,也属于庸俗无聊,都是对汉语语言的亵渎。在新词语兴旺而又泛滥之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辞典收词与其过宽,不如稍严,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一些不堪入目的词语,即使书证再多,也应拒之于新词语辞典之外。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在治学之中,常常因一词之源,费尽周折。《辞源》要求“结合书证,重在溯源”;《汉语大词典》要求“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可见语文辞书溯源的重要。

“卧薪尝胆”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破釜沉舟”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词源就是知识,而辞书就是知识的结晶。重视辞书的知识性,尽可能交代新词语的出处,是编出出类拔萃的新词语辞典的重要条件。

据徐祖友先生考核,在新词语辞书中,唐超群先生主编、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词新义辞典》,熊忠武先生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已经注意此事。两书对不少新词语流行的背景、原因、年代等尽可能作出解说。这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由于新词语产生的年代,一般就是编纂者生活的年代。因此,新词语溯源远易于古词语溯源。例如,“扫黄”产生于1989年秋,[非典]产生于2003年春。新词语一般都为编纂者所熟悉或容易找到根据。这项工作如果现在不做,若干年以后再做就难上加难。

最后,同类辞书并不是不能出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没有比较,没有鉴别,从而也就止步不前,没有提高。但规模相近,释义相近,书证相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毫无自身的特点,这样的重复,几乎没有意义。在我国,新词语辞书,早已不是有无问题,而是提高问题。提高并不仅仅在于溯源,还涉及收词、义项、定义、书证、排检等各个方面。

历史的长河是无止尽的,新词语和新词语辞书也是无止尽的。从基本方面来说,亢世勇主编的《新词语大词典》或许是汉语新词语辞书的分水岭。它不仅为新词语辞书的第一阶段划上了一个句号,而且为未来的新词语辞书开了一个好头。长江后浪推前浪,此后,新词语辞书更应在质量上狠下功夫,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精雕细刻,后出转精,在前人的基础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才是新词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的方向。

巢 峰

2003年6月1日于上海

序二

—

改革开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社会在快速地变化。人们的生活在变,思想观念在变乃至习焉不察的风俗习惯也在变。总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语言学家曾说语言的词汇是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可以看到这种巨大的深刻变化。这也正是社会发展推动语言发展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中产生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有学者说,每天产生一个新词语(包括新义新用法,下同),一年将近四百条新词语(《语言文字周报》2002年10月30日)。有的学者调查后说,一年产生新词语一千条左右。这两个数字不同,可能由于对新词语的标准和新词语的范围认识不同所致。如果把以前语言词汇中没有的新词形、新义项和新用法都算上,再把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产生或引进的新词语也加上,我想必然会看到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不管怎么说,新词语的大量产生,成了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新词语的论文,已发表将近五百篇,已出版的新词新语词典已有四十多部,由此可见,社会对新词语的重视了。亢世勇同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编出一部集大成的《新词语大词典》(下称《大词典》),

填补了词书(语词类)中的空白,为研究新词语和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丰富而必需的语料。其难能可贵不言而喻。

二

(一) 我国的辞书(包括语词、百科专科等辞典)编纂源远流长,如果从第一部辞书《尔雅》算起,已有二千多年了。我国辞书的种类丰富多彩,也为世人所称道。显然,我国是一个辞书大国,但还不是辞书强国。除了思想观念滞后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编纂的手段还比较落后。国外早就用高新技术编辞书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开发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帮助编辞书的计算机软件,辞书所用的字库也没有完满地解决。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新词语大词典》在编纂技术上有了创新,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在超大规模机读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赶上了国际辞书编纂发展的潮流。正因为利用了高新技术,才可能广泛搜集语料并使语料变换聚合的形态,改变查找语料的方式,方便而准确地对语料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每个新词语出现的语境,概括其含义和用法,选择鲜活的例句。由于技术和方法上的先进性,才使过去由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事成为可能。这就大大提高了词典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大词典》收词注意了全面性的原则,它是从四万多条已搜集到的新词语中挑出来的两万多条,条目较过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丰富了许多。可能由于考虑到稳定性、普遍性、必要性和规范性等原则,编者才将已搜集到的条目删去了一半,力求使收入的条目都是无可争议的新词语。就以这样的条目数量看,也是名副其实的“大词典”了。为了深入了解新词语的来

源和面貌,编者在收条时将它们进行过分类,必要时在词典中都予以注明。这既便于一般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些词语的来源和类别,也便于研究者分析探讨使用。编者将所收词语分为新造词语、旧词新用、方言词语进入普通话词汇、外来词、简略词、修辞用法稳定下来构成的新词语、专业用语意义泛化与转移、字母词等八大类。自然,这项工作要花费很多力气,同时也只有用新方法新工具才能完成。这对于我们认识新词语产生的途径,演变发展的线索是很有好处的。

(三) 众所周知,一本词典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释义的准确性,特别是新词语词典。因为这些词语的含义对一般人都是新的,不容易准确全面把握,加之新词语在形成稳定的过程中,意义往往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果释义不准确、不全面就会误导读者。编者充分认识到释义的重要性,所以投入的力量也最多。不仅参考了先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已出版的相关词典,更重要的是利用了计算机将例句集中进行分析、比较、归纳,然后抽绎出其中含义、进行注释。一个词的含义,只有在活的语例中才会具体地显露出来。将尽可能多的例句进行排查,然后归纳概括出该词的含义,这是找寻新词词义最有效的办法。我们的前辈学者(如张相),他们在解释一些前人没有注释过的生词时,就是用的这种科学的方法,破译了历史上不少未见著录的口语词的词义,在学术上取得创造性的成果。前辈们用手工的方法可以做到的,今天用电脑来做,其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必然也会取得可喜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大词典》的释义是比较准确全面的(释义的语言和对某些词语义的概括还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 《新词语大词典》的例句是值得称道的。王了一先生几十年前曾说过,一本词典没有好例句就形同一具骷髅。例句

作用之大,就在于它可以进一步具体地帮助读者理解词义,掌握词的用法。只有这样,才能给读者提供真正掌握这个词的条件,才能圆满地发挥词典的作用。《大词典》中的例句都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实用性。编者选例的原则十分恰当,即“语义准确原则”“用法典型原则”“时代特征原则”和“时间原则(一般选两例,一个是最早的,一个是最晚的)”。这些原则保证了所选例句大都相当到位。

从《大词典》的收条、释义和例句几个重要环节看,工作是比较出色的,除了编者的辛勤劳动和其他客观条件外,用大规模的语料库技术和全程计算机进行辅助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三

《大词典》还有一种有待发挥的重要价值,就是利用它提供的非常丰富的语料进行新词语的研究;研究的成果反馈回来,又可以进一步修订完善大词典。我认为有两个有关新词语的重要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即新词语的界定和新词语的规范。这两个问题是《大词典》编者在编写中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研究新词语的学者经常讨论到的问题。

(一) 什么叫新词语?

也许有人会说,新词新语词典出了几十本,谁还不知什么叫新词语。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以《大词典》来说,编者搜集了四万多条新词语,为什么只选收两万多条?是怕篇幅过大?显然不是。因为编者希望的是全面,规模就是要大。想必落选的两万多条词语另有原因,至少可以推测,落选的新词语肯定不如收入词典的典型和成熟,也就是说作为新词语收入词典可能还有欠缺的地方。这就涉及到对新词语的认识和界定问题。

不妨再从新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来说事。该词典“前言”中说，“主要收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或进入社会生活的新词新义新用法，也酌收部分早些时候出现但目前高频使用的新词语，共收条目 2200 条，连同相关词语约 4000 条。除语文词语外，尤其关注信息、财经、环保、医药、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新词语”。这里透出的信息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词典编成约十二年，以每年产生一千条新词语（见该“前言”）算，应不少于一万二千条，再酌收一部分九十年代前的新词语，应在一万二千条以上，而该词典所收词语却只有二千二百条，再加上“相关词语”也不足五千条。为什么不收另外的七千条词语？编者没有说。是否每年产生不了那么多新词语？从《大词典》编者搜集到的四万多条新词语看，好像不是这样。是否有的新词语不值得收入，或不够典型？可能是。最可能的原因在“前言”中已经透露出来：“新词语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有的会进入基本词语，有的会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而潜藏。”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新词语转入“基本词语”后失去了新词语的身份，或者时兴一段时间后人们不使用了（“潜藏”了）。如果这样理解，又与“前言”中说的“酌收部分早些时候出现但目前高频使用的新词语”有些不一致。因为按早些时候出现目前又高频使用，就应该进入“基本词语”了，它们新词语的身份还存在吗？这些疑问的出现，都和什么是新词语有关。这里的问题是：（1）是否不同于原来的基本词语的新词形、新义、新用法都算新词语，有无别的条件限制？（2）新词语有无时间性，或者说新词语的寿命有多长？按亢世勇同志的文章（《辞书研究》2003 年第 2 期）和《新华新词语词典·前言》的意思，新词语一经进入基本词语中，也就失去新词语的身份了。（3）新词语是否进入了基本词语用什么标准去衡量？

新词语本来就是一种过渡性的词语,汉语中的“葡萄、金刚、塔、站、革命、健康、逻辑、沙发”等都经过新词语阶段,现在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新词语了。也就是说,新词语进入汉语词汇(具有全民词语资格,方言性的、临时性的等等都不能算)后,经过一段时间,能留下来并进入基本词语,它们也就不再是新词语了。是不是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编写新词语词典时,可否标明该词典收入的是什么年代到什么年代产生的新词语?这样也许更便于编者编纂和读者研究使用。《新词语大词典》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每个条目后附有两个例句,一个是最早的,一个是最晚的,就是为了说明新词语使用的年代。

(二) 新词语如何规范?

随着整个社会语文规范意识的增强,对新词语的规范问题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编纂新词语词典的同志也注意到规范性的问题。但无庸讳言,至今并未取得可供具体操作规范新词语的共识和办法。学者提出了许多规范新词语的原则,如教育部语用所的专家提出了九条规范的基本原则(见《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1期89页)。这些原则都很重要,但如何运用这些原则进行规范,却未必容易。应该说九条原则不可能同等重要,其中必然有重要的和次要的;同时,具体到某个新词语,可能体现了某几条原则,而不符合另一些原则怎么办?看来需研究一个具体操作的办法,否则还会让人无所适从。比如当前“非典型性肺炎”流行,有用SARS的,也有用“煞嘶”的(见《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7日第5版),有用“非典”的,有用学名叫“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于是有专家提出用“萨斯”规范命名(见《报刊文摘》2003年5月7日第2版,《南方周末》2003年5月8日第7版)。怎样用九条规范原则去认定谁合规范,就不

那么容易。

新词语规范的原则,应同认定新词语的标准一起考虑。只有当一个词语以合格的身份进入现代汉语普通话时,才会有规范的问题。比如某些新词语只在方言中用,或者只在某一学科作为专业术语使用,我想它们都不应属于规范新词语考虑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网络词语问题,我们不必越位去研究它们的规范问题。因为它们本来就未进入全民的语言,许多网络词语,永远也不可能进入全民语言,特别是那些不合语言构词的基本规律、汉语中本有相应规范词语的网络词语。严格地说,网络词语是网络的专业语汇——确切地说是部分网虫的专用词语,它属于特定的社会方言,或称“行业方言”。网络词语的使用者出于求新求异的需要,具有很强烈的个性化表现,有的犹如江湖隐语,仅仅在“虚拟世界”里实现交际,所以,至少目前它不属于我们规范的对象,原则上也不属于“新词语”的范畴。自然,在语言的发展中有的网络词语可能进入全民的语汇,那就个别现象作个别处理,笼统地谈网络语词的规范问题,提法本身即可商榷。

本文作为一本词典的序言,可能有些不得体,说了一些题外的话。但我想提出这些想法比说一些空洞的客气话,可能对编者和读者更有助益。不妥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教。

李行健

2003年5月10日于北京

前　　言

在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01CYY-002)和山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W01W15)的资助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从1999年起组织人力展开了大规模的新词语搜集与整理工作,收录1978年以来的新词语四万多个,开发了《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在此基础上,我们陆续编纂了一系列的新词语词典,并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流行语小词典》、《实用网络用语手册》;编年体的新词语手册正在编纂;同时,遴选了两万多个词条的《新词语大词典》也已经定稿。在该词典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想结合编纂体会,再来谈谈新词语以及与新词语词典编纂有关的几个问题,给这项工作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同时就教于各位专家、同行。

一、新词语的整理与研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词语大量涌现。很多人对新词语做过统计,有的认为每年产生四五百个,有的认为每年产生一千多个,有的认为每年产生一万多个,并且表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对新词语充满了热情,新词语词典、新词语研究的论著也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新